

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初探*

李明杰¹ 周 亚²

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²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从知识组织的视角,对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进行考察。将之比照于基于“编述”和“抄纂”的古代文献组织结构,发现两者具有一定的对应性。把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划分为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基于文献单元、基于知识单元三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的知识组织方法、知识组织成果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究。本研究对于揭示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因承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文献编纂 知识组织 图书馆学史

[分类号] G302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Document Compiling in Ancient China

Li Mingjie¹ Zhou Ya²

¹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²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the authors make a deep study on th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document compiling in ancient China and argues that there i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tructure of document organizati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such a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ased on natur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ased on document unit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unit. Accordingly, it conducts an in-depth inquiry 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methods, achievements of every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study may help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and modern library science.

[Keywords] document compiling knowledge organization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1 引言

现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迄今,已完成了知识论的转向,涌现出一系列与知识论相关的理论成果,如“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管理论”、“知识集合论”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沟通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血脉联系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因为以往的学术史研究,通常只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界定在文献征求、版本、目录、校勘与典藏的范畴内,而丧失了部分核心内容,文献编纂即是其一。而实际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发生与发展,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近代西方的道路,表现出明显的文献学特质。因长期受制于专制的政治体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它没能在文献的公共利

用方面建立起相应的学说和制度,但却因长期专注于文献内容的整理,在知识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令同时代的西方难以企及的成就。历史上所谓的“校雠学”或“文献学”,实际上为人们利用文献和获取知识提供了学术支持,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发展相适应,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本土化的(而非“图书馆”机构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其中文献编纂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其实质就是古代知识组织。本文即从知识组织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献编纂的现代学术价值。

依照张舜徽先生的观点,文献的生成可分为著作、编述和抄纂三种方式^[1]。著作,强调的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编述和抄纂则是在已有著作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或重新编排,是对文献的组织加工,即文献编纂。虽同为编纂,编述与抄纂还是有区别的。所谓“述”,《说文解字》解释为:“循也”。也就是有所因循,不凭空杜撰。但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文献编纂的知识组织机理研究”(项目编号:2012GSP085)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2-06-24

修回日期:2012-08-23

本文起止页码:122-126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这种因循并不是简单继承,而是有所创造地继承。它要求编述者在对前人作品消化、吸收、领会的同时,还要有所增益,使之更完整;或有所删订,使之更正确。像司马迁编写《史记》,就是博采《六经》、《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的古书,通过裁剪、熔铸、钩玄的工夫总结出来的。对于那些隐晦的道理,还要作一番探微索隐的工作。像汉魏以来汗牛充栋的儒家书籍,几乎都是祖述六经的,基本上都是编述的成果。抄纂则是按照既定体例辑录旧文,其特点是不加改窜地照录原文,一般注明出处,但也有不注出处的。像古代丛书、文集、类书、档案类编的编纂,都属此列。抄纂与编述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原封不动地辑录(依完整程度分全录、节录和摘录)原文,只在编排体例上进行改动;而后者是将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献融会贯通地糅合在一起,通常不注出处,也看不出原文痕迹,有的还有编者个人阐发的见解,因而创作性更强。

按照编纂对既有文献的加工深度,可将古代文献组织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见图1):①一次文献编纂:指对一次文献的原文进行汇编或选编,编纂类型有文集、丛书和类书等。因其照录原文,故与抄纂的文献生成方式相对应。②二次文献编纂:通过著录文献的内容或外部特征来组织一次文献,有时也通过撰写类序和提要来反映图书内容及各家学术源流,编纂成果主要有书目和索引。因其既有对原有文献书名、作者及字词的摘编,也有编者自己的撰述,故其性质介于抄纂与编述之间。③三次文献编纂:通过二次文献的指引获得大量一次文献后,对群书内容、观点、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和综述,编写出一种全新的文献,如历代正史、政书、年表等。因其完全以编者自己的语言来书写,故与编述的文献生成方式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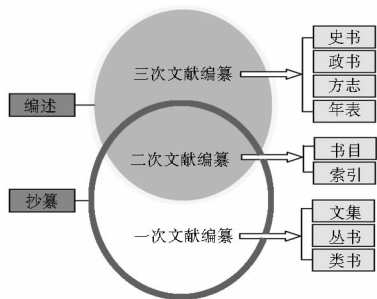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编述”与“抄纂”的中国古代文献组织结构

2 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的古代知识组织

所谓知识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对知识进行整理、

表达与序化的过程。但知识不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必须固化在某一具体的物质载体上,才有可能被人们认知和接受,而文献就是这样一种天然载体。“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在中国古代历来有二重涵义。以东汉的郑玄及南宋的朱熹为代表,将“文”解释为“典籍”,“献”解释为“贤才”。这种对文献的理解,暗自契合了现代知识论对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二重划分^[2]。古代的知识组织与获取就是围绕着“征文”与“考献”展开的。“征文”,即通过典籍的搜集与组织整理,获得书面记录的客观资料,与今天的文献工作并无二致;“考献”,即通过与耆老故旧的口头交流,获取第一手的知识信息,与现在的参考咨询、情报服务也并无本质不同。无论是“征文”获得的典籍资料,还是“考献”得来的知识信息,在古人眼里只有“叙事”与“论事”(见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叙》)的区别,它们都是从事文献编纂和知识组织的素材。由于文献的性质是知识的载体,所以文献组织的实质就是知识组织^[3]。中国古代知识组织与文献编纂是一体的,透过表象的编纂形式,笔者将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划分为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基于文献单元、基于知识单元三个层次,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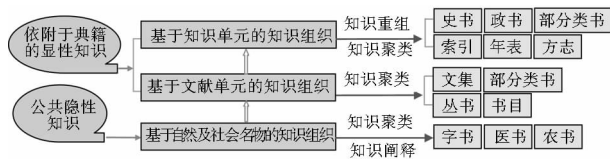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

在人类社会的知识系列中,有一类是人们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下来的对自然及社会的基本认知。它是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具原创性和精髓性的知识。比如古人对天气气象、山川地理、草木虫鱼、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这类知识在没有被系统组织之前,多存在于人类大脑的群体记忆中,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承袭下来,可视之为“公共的隐性知识”。文字发明以后,人们才开始试着用一种显性的方式把它客观、系统地记录下来,而字书(含字典和词典)的编纂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字书作为记录下来的文字系统和知识系统,反映了古人对于天地万物、社会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认知的思想成果。

阐释与组织,是字书这个知识系统形成过程中的两大要素。阐释,是字书知识系统区别于其他知识组织成果的重要特点。解释字词、自然及社会名物的含义是字典和词典的基本功能。如《说文解字》释“祭”:

“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子例切”^[4]。释义、释形、释音兼而有之,故郭璞在《尔雅·释诂第一》中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5]。可见“释”言“通”语是古代字书的基本功能。但古代字典和词典阐释的内容不仅包括字词的读音和含义,对其形而上的旨趣的阐发也是其重要内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编者的“个人隐性知识”来完成它。组织,是字书知识系统形成的另一个要素,其组织模式是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层面的,以汉字单元或自然、社会名物的基本概念(如山川、草木、宫室、器具等)为单位。对语言文字和社会概念的组织,能有效地体现被阐释对象之间的联系。《说文解字》排列组织汉字部首的顺序以及每个部首组织容纳的汉字之间并不是无序可循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安排:它共有540个部首,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每个部首中汉字的排列依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原则,按其意义上的联系进行组织,把这种原则引申开来,“以究万原”,使得整部词典收词数量庞大却不显杂乱。

字书编纂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无所凭借地创造知识,而是将社会上已经存在的长期积累的知识组织起来。这类分散的知识在被组织之前,是零星而不成系统的,美国情报学专家斯旺森教授(Swanson)称之为“未被发觉的公开知识”。在他看来,我们有时候可能并不一定会发觉社会上的某些公开知识,这是因为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时了解这些知识内部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各个部分^[6]。但当这种“未被发觉的公开知识”经过记录者有意识地记录(显性化)、序化(编码化),并将字词及其含义进行匹配(阐释)等一系列处理过程之后,它们就以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留存在文献载体上,成为显性有序的公共知识。

在对自然及社会名物概念进行知识组织时,古代字书采取知识聚类的方法以服务于知识的存储与检索,具体包括:①按韵聚类,如音韵类字典或按四声(平上去入)分部,或按《平水韵》106韵分类排列。②按形聚类,即以文字的偏旁部首为排列的依据和查检的线索。这一方法即源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此后的工具书编纂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③按概念主题聚类,这种组织方法主要体现在训诂类词典中。以《尔雅》为例,全书依“语言文字—社会名物—自然名物”的逻辑顺序,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等19篇,其中前3篇是释语言文字的,后16篇是释社会及自然名物的。按不同聚类方法形成的字书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如按

韵聚类的字书为典型的线性结构,而按形聚类和按概念主题聚类的字书则呈现树状结构。

除了综合性的字书外,古代不少专科性的医书、农书、经书等也属该类型知识组织的成果,如《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医学理论典籍,它既非成书于一时,亦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将战国以前医学知识进行系统组织的集成之作;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记载了农作物的耕种、蔬菜瓜果林木的栽培、禽畜渔的饲养、农副产品的加工等方面的农业知识;《仪礼》则较全面地记录了周代士大夫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方面的知识。这些专科论著的编纂通常也采用聚类的方法进行知识组织和序化。

3 基于文献单元的古知识组织

除去隐性的公共知识外,大量其他知识是以典籍的实体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为了便于保存和利用这些知识,古代学者通常要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基于典籍的古知识组织按照指向对象和加工深度,可分为文献单元和知识单元两个层次。前者是以整部或整篇文献为单元的,如文集、丛书、书目及部分类书的编纂等。它所记录和表达的知识一般是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知识体系,但在具体组织结构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文集的编纂是以篇为单位的,通常从两个角度来聚类文献:①从知识的内容属性或形式属性出发,前者按主题汇聚诗文,如宋人赵孟奎编《分门纂类唐歌诗》,分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仙释观寺、服食器用、兵师边塞、草木虫鱼等八大类,每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后者按体裁汇聚诗文,如《文选》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等38类。②从知识生产者属性出发,如《三苏文粹》、《六李集》按作者姓氏类聚作品,《历朝闺雅》、《吴中女士诗抄》按作者性别类聚诗文,《释文纪》按僧人身份类聚文献,《江湖集》按流派类聚诗歌,《中州集》按地域汇聚作品。

丛书的编纂是以整部文献为单位的,内中各部文献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从知识组织的角度来看,它既可以按一定的知识主题(如某人、某地区或某学科)编成专题知识库,也可以按知识体系编成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哲学、地理、天文、历法、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库。古代丛书常以“海”、“库”、“全”等气势庞大的字眼冠名,就说明了其知识容量之丰富。在具体组织方法上,丛书也有汇编类、地方类、家集类、自著类^[7]等区别。

书目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8]。中国古代书目虽有传录体、辑录体、叙录体之分,但其知识组织的层次都指向作为整体的文献单元。从知识组织方法看,知识聚类法是书目编纂的主要方法。所谓知识聚类,是“按一定的聚类标准分门别类地加以类集和序化的过程”^[9]。而书目采用的是按学科知识体系聚类的方法,通常采用“部(或略)-类(或种)-子目-文献单元”的层级体系,其立类标准主要视学术的发展和图书的变化而定。从知识辅助性手段来看,书目编纂融入了类序、提要等方法,或概述图书内容,或介绍成书经过,或揭示作者生平,或阐发学术源流,其最高目标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书目这种基于文献单元的知识组织形式,便于读者了解一个时代或某一学科的文献总体概貌。

类书的编纂相对复杂,既有以整篇文献为单位的,如《文苑英华》收录萧梁至唐五代时期的作品近2万篇;也有以文献片段为单元的,如《册府元龟》采摘历代经史图书中有关君臣事迹的资料,按人物阶层身份归类成书;还有以文辞语句为单元的,如《子史精华》专采子、史部及少数经、集部书中有关社会情况、自然知识、学术文化方面的名言隽句。在知识组织层次上,前者是基于文献单元的,后两者则是基于知识单元的。基于文献单元的书目编纂,其知识组织方法通常采用以文聚类的方式,也就是按文献体裁聚类,如《文苑英华》分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等39类,这与文集的组织方法类似。

4 基于知识单元的古代理知识组织

基于知识单元的古代理知识组织层次,深入了文献的内容单元。从外在形式来看,它以文献片段或语词为组织单元,记录和表达的知识虽不如基于文献单元的知识组织系统那样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完整的知识体系,但其指向的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知识点,因而分散性和独立性更强。古代基于知识单元的知识组织,从编纂形式来看,主要有索引、年表、部分类书、史书、政书等。

索引的编纂,是将文献题名、作者、出版者等相关事项及文献内容中具有检索意义的实体事项(如人物名称、地理名称、制度名称、主题概念等)抽取出来,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编排,形成新的知识序列以供人们查检。古时那些名为“玉键”、“针线”、“索隐”的书籍,

大都属于索引,如明代张士佩《洪武正韵玉键》是对《洪武正韵》所收各字的分类索引;清代蔡烈先《本草万方针线》是为《本草纲目》编的方剂索引;汪祖辉《史姓韵编》是提取二十四史中的人名按韵编排的一部群史人名索引。它们的编纂都经过了三个步骤:抽取所需款目(人名、地名、职官名等),按类或按韵编排款目,注明款目的文献出处。索引是通过通过对文献知识内容的深层次标引和重新排序,形成新的知识客体。此过程实际上也是知识因子的重组过程。所谓知识因子重组,是知识重组的一种形式,“是指将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抽出,并对其进行形式上的归纳、选择、整理或排列,从而形成知识客体的检索指南系统的过程”^[9]。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因子间的关联并未改变,没有产生新知识,但改变了原有知识因子的空间结构,便于人们检索知识信息。

年表的编纂与索引类似,只不过它抽取的知识点不是一般的实体事项,而是与选定对象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即所谓“大事”),故又有大事编年、大事记、大事纪年等称谓。如果选定的对象是人,则又叫年谱。年表抽取知识点的范围通常不限于一书,即它不是作为读者获取一书知识点的辅助工具,而是广收博取,凡与特定对象有关的文献都在搜检征引之列,可独立成书。在知识序列上,年表有严格的编排体例,即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浓缩了特定对象在特定范围内的各种重要史实。

如前所述,类书编纂也有基于知识单元的,如《册府元龟》以内容片段为单元,《子史精华》以文辞语句为单元。在具体知识组织方法上,类书主要有两种形式:①知识聚类法;②知识重组法。所谓知识聚类,“是指将知识按照一定的聚类标准分门别类地加以类聚和有序化的过程”^[10],这个标准可以是多样的,如《太平御览》、《北堂书钞》以“事”聚类;《文苑英华》、《骈字类编》以“文”聚类;《永乐大典》、《佩文韵府》以韵聚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类书很少像书目那样按学科体系分类,而是依照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知识体系来分类,在类目设置上基本都遵循了“天”、“地”、“人”、“事”、“物”的逻辑结构,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知识重组,“是对相关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进行结构上的重新组合,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知识产品的过程”^[9]。类书的知识重组包括知识因子重组和知识关联重组两种形式。前者如以韵聚类的《永乐大典》,其编纂体例是“以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先按《洪武正韵》列单字,再注音释义,摹写该字各种字体,接着“总叙”该字所代表的名物别称、异名

的含义,最后按义群汇集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旁及奇文互见、诗文词曲等资料。后者是在相关知识领域提取大量的知识因子,对其语义进行分析与综合,以一种融会贯通的形式形成新的知识关联体。如“分门别类,组织撮述”的类书《事物纪原》分55部,将有关各种事物起源的资料按类集中,然后以串述中夹杂编者按语的形式作“总结性”论断,是原文照录、摘录、编述、考证的综合应用。以“利源调度”部“商税”条为例,其下“文王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为:“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为避免芜蔓,与“商税”无关的句子都被删掉了。“古之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句,出《孟子·公孙丑下》,是原文照录。而“此盖商贾之初有税也”,则是编者的按语^[10]。像这种综合性论断就是编者提供给作者的一种新的知识关联体。

三次文献中的史书、方志及政书的编纂,也都是基于知识单元的知识组织形式。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前两者是综合性质的,后者是关于典章制度专题性质的。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同,它们的编纂不可能凭空想象和杜撰,必须以一定的史实、史料为基础,而其取材主要来自文献内容的知识单元。以史书《资治通鉴》的编纂为例:先由司马光的助手范祖禹等人据历代《实录》并参照其他史料,将重要历史事件列出纲目,按年月日顺序调整安排妥当,称为“事目”;然后广泛搜罗与该事件相关的史料,并在该条事目下注明全部相关史料的出处,称为“附注”。“事目”实际上就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知识单元;“附注”是各条事目下对全部相关史料所作的著录,相当于知识索引。在上述工作完成后,再将事目下附注的全部史料检出来通阅一遍,并斟酌详略,比较异同,考订优劣,择善而从,以编者自己的语言综述史料内容,再按既定的编年体例加以排列,形成“长编”。最后再由司马光删削“长编”成正文。这个由实录及其他史书中的一系列知识单元形成《资治通鉴》这一新的知识产品的过程,也是知识关联重组的过程,其内部知识因子之间的关系和结构,经编者重新阐释和组织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5 结 语

[作者简介] 李明杰,男,1971年生,博士,副教授,发表论文近50篇,出版著作3部。

周 亚,男,1988年生,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5篇。

综上所述,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具有层次性、交叉性等特点。在这个知识系统中,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的知识组织处于基础性的第一层次。它以综合性的字书及专科性的农书、医书等,记录和组织的关于人类社会及自然的各方面基本知识,而这部分知识此前大都属于公共隐性知识。基于文献单元和知识单元的知识组织分别处于第二、第三层次,两者都以依附于文献载体的客观知识为组织对象,只不过前者以相对独立完整的整部或整篇文献为单元,后者以文献内容片断或语词文句为单元。在知识组织方法上,由第一、第二至第三层次,从一般的知识阐释、知识聚类,到知识因子重组、知识关联重组,知识组织方法依次演进至较高层次。另外,基于文献编纂的古代知识组织结构与文献组织结构具有某种程度的对应性,如一次文献编纂的知识组织多基于文献单元,如文集、丛书、部分类书等;二次文献编纂的知识组织既有偏重于文献单元的(如书目),也有偏重于知识单元的(如索引),而三次文献编纂的知识组织多基于知识单元,如史书、政书、年表等。这也说明,抄纂这种文献生成方式比较适合基于文献单元的知识组织形式,而编述比较适合于基于知识单元的知识组织形式。对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方法及结构的研究,有助于从知识论角度疏通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 [1] 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7.
- [2] 李明杰.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从文献学路径获得的认知[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1):27-34.
- [3] 刘洪波. 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J]. 图书馆,1991(2):13-18.
- [4] (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徐铉,校定.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8.
- [5] (晋)郭璞. 注,(宋)邢昺. 疏. 尔雅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
- [6]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83.
- [7] 程毅中. 古代丛书与《丛书集成》[J]. 文史知识,2000(1):33-38.
- [8] 彭斐章. 目录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
- [9] 蒋永福,李景正. 论知识组织方法[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3-7.
- [10] 夏南强. 类书知识组织方法及其现代学术意义[J]. 图书情报工作,2007,51(12):95-98.